

中國
十七世紀
思想

楊榮國
東南社
出版

中國十七世紀思想

第一章 緒論

析。
我們要明瞭一個時代的思想發展，對於那一時代的社會經濟情形就得加以一番分

原來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是建立在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組合上。每當商業高利貸資本一發達，把這一基礎破壞了，社會發生騷動，農民戰爭出現，這一封建王朝就此完畢。

第二個封建王朝出現，新的領主對農民們施點照例的恩惠，實行「薄賦斂」以後，這一經濟基礎又逐漸的恢復了原狀。

這情形發展到元明兩代就有點不同了。尤其是在明代末年，情景更加特殊，已呈現

着資本主義的前期景象。我們看以下的分析就可以知道：

(一) 都市經濟的發達。據馬可孛羅旅行記中說：在元代初年，即第十三世紀的末葉時，杭州地方就有過十二個手工業者的同業公會，而這些公會統制着擁有十二人至二十人或四十人手工業者的一萬二千家工場。據另一紀載：說這時杭州的手工工廠是圍繞於衛城而星羅棋布，有着各種不同的手工業者，如製造衣服器物 and 武器之類的在其中工作。所以在第十三世紀時由基爾特所形成之都市經濟就已有相當的發達。

到了十七世紀，適當明末清初的時候，這種手工業的都市經濟更有長足之進展。在一六二五年，正是明代末年，江西景德鎮就是一個大都市的經濟中心，人口已有百萬左右，這可見各工場裏所使用的勞動力是如何的多了。該鎮有名的出產——磁器，已因海外貿易的發達，遠銷至於西班牙法蘭西諸國。又如絲織的物品，更是異常的發達，江蘇和浙江的許多大都市，如浙江的杭州，就是當時生產絲織物的一個大中心點，所使用的勞動力很不少；官營工場所使用的尤多。

(二) 海外貿易的展開。自明代中葉以後，外國商人——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羅馬人、爪哇人和日本人都接二連三地到中國來做生意，廣州和廈門一帶都是他們的中心市場。並且英國於一六〇〇年所成立之東印度公司，其勢力於一六三七年也打進到中國來了。中國商人自從三保太監鄭和下南洋以後，遠涉重洋經營生意的更不知多少。雖說政府裏還在抱着閉關主義，但他們間的生意往還是照樣進行。趙翼在二十二史劄

記上這樣說：

『明祖制定，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欲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朱統爲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統落職。時統已遣盧鑑出檣光頭棟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備矣。會被劾，遂自經死。統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直遂勾倭肆毒。……』（見該書卷三十四）

這不僅寫出那時中外商業上的往來是如何的頻繁與密切，並且還可以看出那時中國商業資本家的勢力已能操縱輿論而進退官吏了。

（三）田賦改征銀兩。由於都市經濟的發達，海外貿易的展開，黃金屬物便特別感到需要。原來繳納賦稅是用實物或錢幣的，到後來都一律改征銀兩了。明史食貨志載英宗初年，改征銀兩的事實道：

『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續文獻通考卷二中亦有云：

『田賦輸銀，始見於宋神宗熙寧十年，……金元以來，無行之者。明洪武九年，雖有聽民以銀準米之令，永樂時歲貢銀有三十萬兩，亦不過任士便民，與折蘇苧香漆之屬等耳。自正統初（英宗年號），以金花銀內庫，而折徵之例定，自是遂以兩爲正賦矣。』

田賦改征銀兩後，所有官俸軍餉都用銀兩支付。只是鄉村中，由於需要銀兩來繳納賦稅，使一般農民感到極大的困難。顧亭林曾這樣言其不便道：「今之言賦必曰錢糧，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亭林文集錢糧論上）不過，這一面雖是促起農民們的更加窮困，引起他們中有的便不得不流亡到都市中來討生活；但在另一面，則便利了工場工業的開展，因爲有衆多的工資勞動者可資僱傭了。

（四）土地之兼併。工商業發達，貴族官僚地主們的營利便益趨積極，土地兼併之風由是大盛，強佔及吞併民田之事是不一而足。續文獻通考卷六中引着夏言上疏的話道：

『各宮莊田，麗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

五項。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佔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先帝（武宗）踐祚之初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割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每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自備車輻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姦用事，朝廷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糜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架搭橋樑，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收放牛羊，采捕魚蝦螺蚌芡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地土，則輾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剋，獲利不貲。……」

這不過是皇莊侵田的一例。其他官僚地主之侵佔更是多不可數。由是農民更困苦不堪，不免流亡載道。錢士昇於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曾上言說戶口流亡之慘，謂限田以蘇民困（見明史卷二百五十一錢士昇傳）。最後當激起大規模之農民暴動，如鄧茂七之領導抗租，王朝佐之代衆受刑，以及唐養兒劉千斤之亂等等。

封建經濟的基礎就此破壞了。如果不是滿清入關，又是一套落後的封建統治，中國資本主義的開展是很有可能的。

那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是如此。

至於文化方面，因了海外貿易發達的關係，西洋科學思想於此時大肆輸入。在天文和曆法方面，萬曆時有意大利人利瑪竇著「乾坤體義」和「經天該」；在「天經該」一書裏，把西洋已經測知的恆星，作成了歌訣。德人湯若望著有「曆法西傳」，其中紹介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和加利略諸家的天文學說，只是關於哥白尼的地動說沒有提一個字。並且在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政府下詔改用新曆，惜不久國變，沒有施行。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利瑪竇除在所著「乾坤體義」下冊專談數學外，又和徐光啓合譯希臘人歐幾里得之「幾何原本」前上卷。湯若望著「遠鏡說」，這是西洋光學傳入中國第一部書。萬曆時，意大利人熊三拔著「泰西水法」六卷，是中國農學界一部空前著作。天啓時，經陽人王徵從德人鄧玉函譯成「奇器圖說」四卷，闡述力學原理甚詳。在哲學方面，李之藻與葡人傅汎際合譯「名理探」十卷，是西里士多德的論理學最初傳入中國。天主教士王豐肅著有「空際格致」，闡明火氣水土四者爲宇宙本體。意大利人艾儒略著「西學凡」，闡述哲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

以上這許多種科學，都於中國當時的思想界有極大的影響。

於是原來以禪學爲其鵠的、講良知、講明心見性的王學，在這社會經濟激烈的變革之下，在這歐西科學和哲學思想廣泛的傳入之下，終於發生了極強烈的反抗；並且還影響到對於宋學的反抗。

首先對王學張反對旗幟的，乃是顧涇陽涇凡兄弟和高景逸他們於明萬曆三十二年（

公元一六〇四所建立起來的東林學派：他們除一面排擊當時朝政的種種設施外；對於王學的主旨，如所謂「心即理」「致知即格物」和「說本體不重工夫」之類，均一一予以批判。他們以爲說所謂「心即理」，乃係外事物以說心；外事物以說心，不獨心無所憑藉，理亦無所從出。至於致知則必先行格物，明本體則必先重工夫，不如此，則客觀事物之理是無法明白的。

接着反王學而較爲澈底的，乃以劉宗周爲首的蕺山學派。他們標出「證人」主義，講求「慎獨」；反對空談，趨向實踐；對於王畿羅汝芳王艮諸人所闡述的王學痛加駁斥。自後攻擊王學之空疏的更加風起雲湧了，下面我們就可以讀到一片的反王學的聲音

顧亭林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這是反王學中的良知學說的。

朱舜水說：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爲應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朱舜水集

答林春懷問

這是反王學之講正心誠意。

王船山說：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曾學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論）

這認王學爲陽儒陰釋之學。

李恕谷說：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卽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擗管呻吟，自矜有學。」（恕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這認王學空疏已極，與實際無補。

費此度說：

「清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尙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類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爲兩斷，一段好議論，善聽而已。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情愈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

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裏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台止觀同一門戶，……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徧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見所著引道書中）

費氏的這一段話，也是罵王學空疏，認王學無補於當前的現實。不過費氏所罵的較李恕谷的更為透闢。

這些大師們一面攻擊王學之脫離現實太遠，無益於民生國計；另一面他們自己則提出了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主張來。

於是首先他們不得不武裝他們的頭腦來向空疏的王學作鬥爭。

原來王學就認定人類有所謂良知良能，換言之，即認定有所謂一先驗的理存在。由這一先驗的理來支配人世間的一切。這是王學的唯理世界觀。

這一世界觀的發展，不僅不曾支配得客觀的現實，反而為客觀的現實把它批駁了；於是產生了另一个新的打擊它的（指王學）觀點，這個就是王船山他們這班大師所具有的唯氣世界觀。

所謂氣，就是指客觀的現實，就是指發展中的社會經濟。唯氣世界觀，就是認定所有的道理，均為客觀的現實，均為發展中的社會經濟所規定。清初諸大師們把握了這一正確觀點，就作為他們進攻舊社會的思想武器。

又原來宋儒們故意抹煞活生生的現實，同時又受了禪學的影響，倡道所謂「禁欲主義」，專門拿「理」來責人，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陷人民生活於絕境，還不敢有所申訴。

黃宗羲和王船山他們，由於都市經濟開展和農民向都市流亡所給予的影響，認爲所謂「理」只是存乎「欲」，要有「人欲」才有所謂「天理」；換言之，要人民生活獲得改善才能談得上是有天理。這給「以理責人」的宋學以有力的批判。

於是對於客觀社會的認識，宋儒和王學都偏重於主觀的冥想，以爲「靜坐」中的悟性工夫即可以理解到宇宙間的一切。顧（亭林）王（船山）黃（宗羲）顏（習齋）他們對於這一論點便大肆反對，以爲要認識客觀社會非身體力行無以爲功；冥想，乃至於鑽研書本都是徒勞的，不能經世致用。

對於政治，因了適應都市經濟開展的要求，他們中（指顧、王、黃、顏）大都反對君主專制而倡導民主；這一點，在黃宗羲的思想中，表現特別積極。

怎樣實現民主的政治呢？

他們都是儒家學者，都提不出具體的辦法，只知道以復古爲解放。

這就是恢復古代的封建（按此「封建」，只是對後來的郡縣而言，並不能解釋成爲封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是指今日所稱謂的封建社會性質的）學校和鄉學里選諸劉

度。

他們以爲古代的封建制度，君主的權柄沒有那麼大，不會事事操縱在他一人的手裏；換言之，即不會由他一人來專制，分得地方也有些權限，可以使得政治要趨於民主一點。

這也由於當時社會的一切腐爛，使他們看透了專制的弊病。即如在顧亭林的論點中，他亦主張在實行郡縣制之中，應寓有封建之意；並且他認爲君主，只是爲民而立，他的所得，只是代耕以祿，不能有特殊的享受，不能由他專權。恢復學校，就是建立起一個民意機關，可以對於政府裏的不法官吏或政事之措置失當的執行彈劾或檢舉。

至於恢復古代的鄉舉里選，他們認爲：一則可以由人民擁戴地方公正之士來參加政治，把地方的事情辦好一點；二則還可救考試制度之窮。

除此之外，他們中——如顏習齋和唐鑑萬還具有初步的男女平等觀點；尤其是唐鑑萬在他所著的潛書裏而說的更爲明白。

同時，因了滿清之入主中國，致使他們民族主義的觀點特別發達；他們不但在言論上有相當激烈的表示，並且在實際上還進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民族復興運動。所可惜的，他們歷次的運動都宣告流產了。

他們的經濟觀點，主要的就在於如何分配土地一問題。

有的主張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施行土地國有；如黃宗羲他們是有的則主張暫時維

持土地的私有，反對馬上實行井田限田和均田諸制度，如王船山他們是。

黃宗羲他們為什麼主張土地國有呢？

這是由於引導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必需性所引起的。

因為土地國有了，所有地主對於農業土地上一切壟斷就告取消，就不會有這增加起來的絕對地租，打破了農業對於引導到資本主義開展的局限性，使之更適應於市場上的需要。換言之，各色各樣的封建制度或封建關係就因此而燬壞了，開展資本主義的障礙告肅清。

在這中間，雖還保留了一種差額地租，但那是沒有什麼壟斷性的。

所以黃宗羲他們一面主張土地國有，另一面就主張發展工商，認定工商為立國之本。這是與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大異其趣。

至於王船山他們主張暫時維持土地的私有，我們雖不能直認他們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相一致，是在引導到農業資本的開展；但他們之重農，之以土地的生產為本，以及維護農村經濟的繁榮等等，則是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完全相同的。

法國的重農主義者被娃居伯 (Pierre Boiguérest) 和蓋斯內 (François Zuesenr) 他們，為了要使農村經濟趨於繁榮，都認為穀價應高，如果穀價低了，就等於農業的放蕩。

王船山他們也是一樣的，也以爲穀賤是要傷農的；如果要使農村經濟能夠繁榮，穀

價就應該使之提高。從這點說：他們大有鞏固農村，引導到農業資本開展的趨向。

這樣說來，不管走上工業或農業資本的道路，中國那時實有可能。但爲什麼均沒有走得上呢？

這因爲這所開出的資本主義的嫩芽，首先就遭受了落後的滿清的封建統治，接着不久又是瘋狂的鴉片戰爭，便把這枝嫩芽絞殺於它的母胎之內。這不僅沒有完成得它對於封建統治的革命任務，反而形成了這後來的半殖民化的而先作充進資本主義國家附庸的命運。

至於那時的科學思想，除了歐西科學思想所給子的影響以外，主要的還是都市經濟發展上的需要（註），所以呈現着非常活躍的景象。

如宋應星之於工藝科學，他曾著有「天工開物」一書，專門討論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的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地質學家丁文江氏曾這樣說：「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見所著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又如王履和李時珍之研究博物，前者著有「傷寒立法考」「百病鈞玄」和「醫韻統」諸書，後者則著有「本草綱目」，尤以後者爲最有名。關於物理學，有方以智之研究物質，著有「物理小識」一書。徐霞客之考察地理，著有「徐霞客遊記」。至於農學，有徐文定著有「農政全書」六十卷，內分農本三卷，田制二卷，農事六卷，水利九卷，農器四卷，樹藝六卷，蠶桑四卷，蠶桑廣類二

卷，種植四卷，牧養一卷，製造一卷，荒政十八卷；可謂集農學之大成，都於農業資本開展有極大的關係。曆算學之研究是尤其普遍，除程大位著有「算法統宗」，於算盤的應用因之獲得普及外；用西法研究而最有成績者，當推宣城梅文鼎，他所著異常豐富，有「勿庵曆算全書」二十九種，凡七十四卷。由是可窺見當時的科學思想之活躍。

綜上所述，可知十七世紀的中國思想是如何的蓬勃與進步，考其所以蓬勃進步之由實由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有了變動，已呈現着資本主義活躍的前期形態；因而反映在思想的爭鬥上，一方面否定着舊的靜止的煩瑣的和專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則在創造着新的實踐的科學的和民主的思想。這一系列的進步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就是黃宗義顏習齋上船山和顧亭林他們。

（註）從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畢方濟上疏中就可略知其梗概，他說：「臣蒿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曰辨疆脈以裕軍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購西銃以資戰守。」

第二章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冲，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餘姚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〇九），卒於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八十五。

宗羲的父親忠端公尊素，是東林名士，爲閹宦魏忠賢所害，死在牢獄；那時宗羲已有十七歲。

毅宗卽位，宗羲年十九，袖鉄錐草疏入京，訟父親的冤。到京，魏忠賢已伏誅，他除以手刺殺父的獄卒外，並上書請誅閹黨。由是他的聲譽日高，隱然是東林子弟領袖。他讀書，非常發憤。對於經史、天算、百家、九流以及釋道之書，無所不窺。並遵父親的遺命，就學於山陰劉宗周蕺山，所得更加深粹。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北京陷賊，福王立於南京，係閹黨阮大鍼柄政，大興黨獄，名捕宗周和許多正人，宗羲也在其列。於是宗羲避難亡命日本，經長崎，達江戸。次年（一六四五），福王走，南京覆，他和錢忠介（肅樂）起義兵守浙江拒清師，轉世忠營。不幸失敗，便遁入四明山寨，把餘兵交給王完助（翊）。稍後他到舟山魯王

那裏，和張蒼水（煌言）馮驥仲（京第）等力圖匡復，仍常潛行往來內地，布置一切，清廷非常恐懼。

他奔走國難所經歷的艱苦，他在南雷餘集怪說中說：「自北兵南下，縣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壇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邇哨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

直到後來，宗義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奉母歸里，潛心著述，曾設「證人講會」（按「證人」乃宗周所著書名）於浙東，一時徵學的頗不少。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詔徵爲博學鴻儒，以年老固辭。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卷，「易學象數論」六卷，「律呂新義」二卷，此外還有「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南雷文定」「南雷文約」「明文海」「明史案」等數十種。

（一）宗義的唯氣論及其對於唯理論的批判和他自己的局限性。

宗義的思想，除時代所給予的影響以外，一則承接了東林的遺緒，二則受了劉宗周的薰陶，所以表現的非常卓越與進步。

他論「理氣」就受劉宗周的影響很深。

宗周說：「盈天地間，二氣也，氣卽理也。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物得之以爲人物，一也。」又謂：「或曰：需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邇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